

军事科学出版社



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回忆录 在五角大楼关键的七年

〔美〕卡斯珀·温伯格 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译

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回忆录

在五角大楼关键的七年

〔美〕 卡斯珀·温伯格 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

Caspar W. Weinberger
FIGHTING
FOR PEACE
Seven Critical Years
in the Pentagon

A Warner Communications Company, May 1990
根据美国纽约沃纳图书公司1990年5月版译出

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回忆录
在五角大楼关键的七年

〔美〕卡斯珀·温伯格 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译

*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75印张 289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021—267—X/D·011

定价：6.40元

内部发行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马学印、樊高月、符成礼、孟兵、初源盛、万伟、姜绍崇、张毅军、李婷、张彧和杨文。参加校对的有：初源盛、姚云竹、王保存、朱宗良、孟兵、马骏、符成礼和蔡祖铭。全书由聂送来、蔡祖铭统校。

出版说明

卡斯珀·温伯格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在陆军服过役，1981—1987年任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是80年代美国政坛和军界的风云人物和美国对外政策、国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他的战略与外交思想至今对美国现任政府仍有影响。

在对苏关系上，温伯格属强硬派人士，极力支持里根政府“重整军备”的战略方针，并且拟定了美在新时期对苏的“竞争战略”。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摆脱侵越战争失败给美国带来的阴影，重新获得对苏综合国力的优势和在世界的霸权地位，这与温伯格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

在对华关系上，温伯格曾多次来中国访问，受到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接见，为中美建立和发展军事交往做出了努力。1989年6月北京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以后，在美国有不少人声嘶力竭地叫嚷要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情况下，他却较为明智，仍希望美国与中国的军事交往恢复正常。他认为，作为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有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中国对美国，美国对中国，都太重要了”；“美中关系本身和所产生的影响就是极其重要的，而不仅仅是起战略大三角的作用”。他还认为，“中国政府确定它必须对大规模的学生示威作出反应的原因，是领导人担心文化大革命会复活，并因此决定阻止它”。为反对某些主张严厉“惩罚”中国的错误观点，他指出：“从长远观点看，惩罚中国将使美国受到更大的惩罚。”基于以上种种认识，他积极支持布什的对华政策，他认为，“到目前为止，布什总统在要求给中国越来越多的惩罚的一片呼声面前，似乎采取了十分恰当

的步骤。”与此同时，他强烈要求美国不要因中国发生的动乱，“就试图对中国人施加过多的惩罚”。不言而喻，温伯格在对华政策上所持的这种立场，同西方某些政治家相比，是富有远见的。它有利于促进中美两国的交往。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温伯格持此立场的动机也是昭然若揭的。正如他在本书中所说，应该鼓励中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要建设性地帮助他们转变”。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若希望改善经济状况和提高人民的生活，就必须实质性地改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期信奉。”这不仅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缺乏正确的理解，而且反映了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妄图将我国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成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附庸。他在本书中还明确提出，对中国要采取“极为老练的外交手段”。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保持清醒的头脑。

本书是温伯格离任国防部长后，根据其在五角大楼任职7年中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所撰写的一部长篇回忆录。作者在书中作为当事人，详尽而系统地叙述了美国在里根时期的许多与安全 and 防务有关的重大问题、事件、活动和战略决策，特别是那些年所发生的一些最重大的事件。诸如里根总统遇刺、美军入侵格林纳达、美军在黎巴嫩受挫、美军袭击利比亚、美国在马岛战争中的立场、美日防务关系、中美军事交流、苏美中导条约、伊朗门事件、美舰在波斯湾护航，以及美国国防预算和战略防御计划等等，均有详细叙述。在叙述中，作者阐明了各重大事件和活动的过程，透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情况，揭示了美国国内外的种种尖锐矛盾，总结了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当然，由于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看问题，他在书中的论述也不乏片面的和错误的观点，希望读者注意鉴别。

本书于今年5月在美国出版，出版后引起很大轰动。书中史料丰富，观点鲜明，文笔清晰，对研究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

系、苏美关系和日美关系，对研究国际形势及其发展，对研究美国外交、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译文个别处略有删节。原著中的注释分别附于各章之后。在译文中的个别地方，我们加了译者按语。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0.7.10.

作者的话

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将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合为一体。该法中有这样的话：“特此成立国防部作为政府的一个行政部”，“国防部长是该部的首长”。

我是从1981年1月20日至1987年11月23日担任国防部长的，下面我将要叙述的正是这段时期内安全与防务方面的某些重大问题、事件和活动。

当然，关于这些事件已有许多其它的记述。有些记述可见之于在里根政府中供职的一些人的回忆录，但他们并不负责防务。出现在报纸和期刊中的众多其它记述虽然写了许多东西，但这些作者当时并不在场，或者并未亲自参与他们所写的那些事件。

既然我是当事人，所以长期以来我一直想把这段历史以及在这段长达7年的时期里所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

对我来说，这样做是适当的，而且这的确也是我的责任，因为在那段时期，我曾有幸扮演过一个小小的角色。作为一个曾经阅读和研究过大量历史的人，我总喜欢阅读亲自在那些伟大事件中发挥过某些作用的人所写的著作。这些个人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温斯顿·丘吉尔的《世界危机》、迪安·艾奇逊的《参与创世》以及长达8卷的《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总使我覺得比其他著作更生动活泼。尽管这些个人著作的作者的素养可能不像历史学家那样高，但这些亲身经历者的个人著述总是远比其他第二手或第三手报告更能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亲临其境的感觉，无论那些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第二手或第三手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的文笔多么出色。

把所有的故事都写下来（即把将近7年里所有的日子里发生

的所有事情都写下来），那是以后的事情。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把一个当事者所认为的那些年中所发生的某些最重大的事件尽快地写出来。

以个人的回忆为轴线书写这些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使我再次感到：同那么多异常杰出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在一起工作是多么幸运和光荣。这些人才华各异，是对我们国家和我们自由的献身精神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首先要谈到的当然是里根总统。正是他的领导、政治勇气和远见确保美国得到了只有通过军事实力才能得到的利益：武器的削减和日益增强的稳定。他是最应该感谢的人，因为他以他的信心和信任，给了我无与伦比的机会，使我得以追随他在这一历史时期扮演一个角色。

我还必须向许多其他人士表达我的谢意，如威尔·塔夫脱^①。我在联邦政府里工作的全部时日里与他的合作极为和谐而愉快。他默默地完成了具有巨大价值但直到现在才为人所认识的工作。还有弗兰克·卡卢奇，我与他在各方面的合作同与威尔·塔夫脱的合作几乎一样长久，而且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忠诚、技巧和效率。

科林·鲍威尔上将、卡尔·史密斯中将以及戈登·福奈尔中將都是我手下的高级军事助手，他们多方面的协助使我得以完成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他们都是优秀的军官。的确，他们之所以被所在的军种推荐到这里，正是由于他们都那么能干。离开我的部门后，他们都继续被委以其它重任。如同一贯的表现一样，他们干得同样出色。我认识科林最早，那还是在1970年他获得倍受推崇的白宫优秀工作者称号的时候，当时我在管理与预算局供职。他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一美国最高军事职位，对美国现政府和我们国家的益处都是难以估量的。在同我一起工作并使我感到骄傲的其他优秀军事助手中还有唐·琼斯海军上将以及海军陆战队中校里奇·希金斯。出于全心全意的服务热诚，里奇于1988年

2月以联合国驻黎巴嫩非武装的联络使团指挥官的身份到贝鲁特执行实地侦察任务。由于位置太靠前了，他被某些狂热的派别扣作人质。扣押者后来杀害了他，这是他们兽性大发的又一次表演。里奇·希金斯对祖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死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还有许多的人也值得提及：里奇·阿米塔奇，他对亚洲、中东以及其它许多地区的深刻了解与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对大大改善我们与这些最关键的国家的关系以及增进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友谊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还有理查德·珀尔，后期还有他的副手弗兰克·加夫尼，他们对军备控制与裁军的渊博知识足以证明凡夫俗子们的见解是多么荒谬。他俩给我的帮助特别大，尽管我们在政策问题上意见偶尔也有分歧。

当然，谈国防部的工作，如果不提我的行政助手凯·莱什，那是不全面的。她以精通业务、具有耐心、善于交际和极富判断力而著称。她是在1980年卡特政府向里根政府过渡时期加入我们这个班子的，现在仍为我安排工作日程、旅行、接待记者以及发表演说等事务。她对形形色色的将军、部长和外交官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一点就更不用说了。公正地说，如果没有她的卓越贡献，我就很难完成每天的工作。

我还要感谢约翰·邓肯多年来对我发表的演说、撰写这本书以及其他种种工作的有益的帮助。

我感谢伊娃·斯潘塞和她的3个在罗杰斯·韦尔斯公司工作的负责文字处理的助手卡罗尔·埃尔德里奇、文森特·舒勒和索科罗·维当斯，感谢她们出色地完成了本书手稿的打印工作。

我还要感谢更多的人，其中包括西尔马·斯塔布斯，她像对待其他7位国防部长那样忠诚、勤奋和愉快地为我服务；还有乔·扎西与比尔·布朗，他们用渊博的知识保证我们在国内外不犯错误。

还有少数其他的人，非常少的一些人，我对他们所给予的一贯有效的帮助、支持和不断的鼓励深表感激。他们会明白我指的是他们。我知道他们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向他们致谢，如果要致谢的话。

再就是几百万在武装部队服役的人们，我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甚至怀有更深的敬仰以及更大的责任感。杰克·维西上将的身上体现了美国军人所有的优秀品质。开始他同我一样，也是步兵部队里的一个大兵，后来，他成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在当参联会主席时与我密切合作。我们之间关系融洽，我对他怀有最强烈的钦佩之情。他的继任者威廉·克劳海军上将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军官，在他任职期间我与他始终合作得异常融洽。我还要感谢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是他们如此巧妙地支持和帮助我们，是他们日复一日地回击了那些起劲地攻击“官僚们”的蠢货。

再就是简，我的妻子。她在我的事业一开始时就与我在一起，当时我俩同在陆军服役。当我又有了新的开始，即第一次竞选加州议员时，她仍与我在一起。我们都需要支持和激励，我们都应有勇气。而她总是给人以支持和鼓励，给人树立有勇气的榜样。我这本书就是献给她的。

注释：

- ① 他现在是美国驻北约的大使。

前 言

对我来说，这部历史是从1980年11月当选总统打电话邀请我出任国防部长时开始的。但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在此之前的许多年以前，当我对历史和政治的潜在兴趣被父亲激发出来时，这部历史就已经开始了。父亲利用睡前讲故事的时间给我和兄弟讲了他自己编的故事，那是个关于宪法的起草、制宪会议上的各种争论和妥协的故事，我们的国家就是根据制宪会议上的争论和妥协建立起来的。父亲的这个故事连续讲了几个星期，而且讲得那样有趣和扣人心弦，我和兄弟每天晚上都急切地想知道后来的情节。只有讲故事的能手才能对不到10岁的孩子讲清楚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是怎样规定出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权力，并确立两院的结构。但父亲的确是一位讲故事的能手，而且他和母亲都是极能理解人和打动人的家长。母亲是位天赋很高的小提琴手，但她欣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因为她确信自己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孩子们身上。她果真这样做了。我对音乐以及一切艺术的极大兴趣就是从她那里获得的。

在我看来，父亲似乎总是对政治抱有极大的兴趣。我猜想，这种兴趣大概始于他在科罗拉多大学积极参加校园政治之时。1910年从法学院毕业后的那个夏天，他曾在科罗拉多州议会工作过很短的时间，这使他对政治的兴趣进一步浓厚起来。

父亲继续培养和支持我在童年时期对政治萌发的兴趣。我7岁时，他鼓励我用一个非常原始的收音机收听1924年在纽约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情况。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要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共需获得102张选票。那次大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象。踏进中学校门后，我对政治的基本兴趣不但没有减退，反而由于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实行新政而变得更加浓厚起来。我如饥似渴地吸收政治知识。当然，我还以极大的热情密切注视1932年的大选情况，并至今保存着那年两党代表大会的剪报资料。我是赫伯特·胡佛的坚定支持者。胡佛似乎不像个能使15岁的中学2年级学生着迷的人，但我一直很崇拜他，关心他的命运。

11岁的时候，父亲曾带我参加了1928年竞选时旧金山市一家饭店为胡佛举行的招待会。1932年的选举日，我与几百名学生到旧金山市政厅欢迎胡佛总统，他刚刚结束漫长而不顺利的连任竞选活动。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从市政厅的一个窗门走到凉台上时，那副精疲力竭和极度沮丧的样子。当时他就站在林肯塑像的上方，向远道前来受美国总统接见的学生们挥手致意。大选已于那天上午结束（我曾跟着父亲到我家附近一处用幕布围起来的投票站，看着他投了胡佛的票），人们认为不参与党派之争的学校让自己的学生们见见总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在家里，我们自然也像1928年时那样，通过收音机聆听1932年的选举结果。两次选举结果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1928年，收音机的晚间广播是从当选总统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的家中播出的，各种学生团体都在赞美他，校园里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唯一不那么欢乐的声音来自一位学生，他通过广播说，人们为胡佛获胜感到高兴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上台后定会把当时的斯坦福大学校长雷·莱曼·威尔伯拉进内阁。这件事后来的确发生了。可是到了1932年，选举结果就不一样了。亲眼目睹政府、政治家、甚至国家的命运瞬息万变，我又受了一次极有价值的教育。

罗斯福就职后不久，“新政”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实行了，报纸上充满了有关“新政”的最初的建议、计划以及激烈辩论的报道。这些报道使我迷惑不解，因为它们太不完整了。我感到如果

只读报纸便不可能对“新政”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于是我写信给加州的一名国会议员，请他给我寄《国会记录》。这些材料总是按时寄来（一般出版7至8天后寄到），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材料，甚至连所谓的“存档发言”，即从未在国会上宣读过的讲话稿也不放过。

通过这种方式，我获得了有关国会程序的宝贵知识，对正在讨论中的许多法案的本质也有了透彻的认识。我对其中的大部分法案深感忧虑。我认为这是在模仿其他国家的制度，试图制定详细的计划和严格限制个人行动的规则。这些规则将从根本上威胁我国实行个人自由的各种伟大机会，而正是这些伟大机会缔造了这么多的新兴工业，并给这么多人带来了高水平生活。我读过亚当·斯密的一些著作，并基本上同意其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我还研究了胡佛1932年的竞选活动，对他倚重个人主义的态度大为欣赏。我觉得这个国家之所以如此迅速地繁荣起来，取得巨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每个人都享有高度的个人自由。我那时和现在都坚信，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好处的制度是允许每个人凭借自己的能力，选择能使自己发展得最好、最快的道路或阶梯的制度，只要他不干涉他人利益就行。

我明白，或自以为明白，我们1933年所面临的大萧条是各种国际因素造成的。同时我还坚信，我们可以等待造成萧条的许多因素自行消失，而不必通过新政府每天出台的积极（当然也是更令人激动的）措施来克服萧条。不过，关于这些问题我也许会在以后的著作中再来详述，因为我希望把本书的重点放在1981至1987年间美国政府为改善和确保我国以及盟国的安全所采取的主要行动上。我提到童年时代的回忆只是想说明，我对所有政府和政治方面的事务始终具有浓厚的兴趣。

1934年我进入了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不得不潜心苦读，最后终于通过了当时哈佛大学要求每个本科生必修的外语课程（我始终遗憾自己从未把外语搞好）。之后，我便主

要攻读政治和英国历史课程。我仍然信仰和推崇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和个人自由的理论，并相信集体集中的计划经济是危险的。在那段时期，一到对时局发表意见时，我便多少成了所谓保守派和反新政派人士的代言人。我还记得哈佛大学讲授政治学课程的大名鼎鼎的阿瑟·霍尔库姆教授往往在下课前大约5分钟中止讨论，说道，“让我们听听保守分子就此还有什么要说的”，然后便叫我发言。

我的许多观点还出现在哈佛大学日报《深红色报》的社论中。我大学本科期间的大部分时光都花费在这个编辑部里。《深红色报》当时是（而且现在仍是）一份有独到见解的大学日报。我认为，编辑部里的工作对我学会如何在发言或文章中明确表达自己对国内外事务的看法有很大帮助。我这样做经常使其他同窗感到有趣，他们或者不像我那样执着，比较摇摆；或者信仰同我一样坚定，但信仰的理论却完全相反。当时，“新政”使许多人感到兴奋不已，而兴奋又往往会产生出热情。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发表自己的观点时已不像以前那样火药味十足了，这绝不是因为染上了哈佛的冷漠病，而是因为哈佛“健康的怀疑主义”改变了我表达意见的方式。

随着欧洲大战的日益迫近，我抨击“新政”的兴趣逐渐转为对德国再次称霸欧洲的企图的忧虑。我觉得当时的情况在许多方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形势的重演。我对英国缺乏战争准备越来越感到不安。当时，温斯顿·丘吉尔在其激动人心的卓越讲演中已指出这一问题。我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倾向也深为不满，这一倾向不论是非曲直，只求一味回避战争，根本无视我们的盟友是正义的而德国人是非正义的这一事实。我从来不喜欢中立。我总觉得存在着对的一方或错的一方，重要的是加入对的一方。但仅仅加入是不够的，加入对我来说意味着积极的支持。

我极为钦佩西奥多·罗斯福，这倒不是因为我赞同他的全部

观点，而是因为他有投身于事业的热忱，蔑视那些只乐于做旁观者的人。我与他怀有同样的感触，即唯一高尚的事业是亲临角斗场，勇猛搏斗：

事业是由这样一些人成就的：他们亲临角斗场，脸上沾满灰尘、汗水和血迹；他们勇猛地搏斗；他们犯错误、屡遭挫折，因为任何努力中都会有错误和缺点；但他们确实在努力奋斗；他们体验到高涨的热情、伟大的奉献；他们献身于值得献身的事业；最终，若是他们能取得最好的结果，便能体验到成功后的巨大喜悦；即使按最坏的打算他们失败了，他们至少也是在进行伟大尝试时失败的；因此他们的灵魂将永远不会与那些冷漠而胆怯，既未体验过胜利，也未尝受过失败的灵魂同处。^①

我遵从父亲的愿望，投笔从戎之前先完成了哈佛法学院的学业。但刚一毕业我便决定要去参军，而且一定要去当步兵。我的这一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在哈佛时读过的一些小说的影响，特别是西格弗里德·萨松的《捕狐狸的人的回忆》与《一个步兵军官的回忆》。读过这些书的其他读者一定知道：这些书之所以对人们有影响，决非由于步兵军官的工作有什么魅力和振奋人心之处。我实际上是被这样的信念所打动：步兵的生活道路是唯一正确而光荣的服务之路。母亲的新英格兰血统大概也加强了我的这种信念。在她父母生活的时代里，新英格兰的世界观似乎建立在这样一种普遍观念上，即只有最艰辛的事业才是光荣的，任何享受都是不应该的！（我必须承认，当我真的于1941年9月在旧金山参加陆军并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雷要塞——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后，在头几个星期中干的工作主要是帮厨和打扫厕所，我那十字军骑士般的激情顿时消失了不少。）

然而，对我触动最大的还是我们对战争完全没有准备的状态

况。这点反映在教官、军官和同事的态度上。我的同事大部分是被征集而不是自愿参军的。蒙特雷要塞以及后来加利福尼亚州的罗伯特军营发给我们的武器装备也很说明问题。有一段时期我们用的是木制的步枪仿制品、被叫做“手榴弹”的木头疙瘩、少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刺刀以及一些动不动就出毛病、显然是1914年之前制造的机枪。

我以前从未打过枪，或者说从未使用过任何武器，可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似乎就成了优秀射手，其实我只是按着教官讲的做罢了。因此尽管我对总的战备情况非常不满，但我觉得陆军的训练工作基本上还是不错的。我的大多数同事（他们中许多人有着丰富的狩猎经验）对陆军教官坚持让他们保持正确的射击姿势感到十分恼火。尽管他们是狩猎老手，但却很难击中任何目标。

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第41步兵师，该师开往新几内亚时，我们训练和准备工作的不足便暴露得更加明显了。我们这些人（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谁也没有见过丛林，也不知道如何适应热带气候或丛林环境。

相反，我们的对手日本人在丛林战中却训练有素，似乎很少受疟疾或丛林中其他危险因素的影响。他们在隐蔽方面也极为在行。记得有一次，日本人设法把一门巨型舰炮隐蔽到布纳简易机场附近的可可树丛中，使得这个简易机场几天不能使用。他们还会把枪手高高地绑在树顶上，我们的巡逻队看不见他在什么地方，常常遭受意想不到的危险。（幸运的是，现在我们在巴拿马已有了非常好的丛林训练学校。我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去那里视察时惊喜地看到，课程中甚至包括突然面对巨蛇的处理对策。）

可以肯定，正是这些早期的实战经验以及我所知道的1939年战争开始后英国由于准备不足所出现的问题，使我深深懂得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任何国家来说，没有武装和不做战争准备是极端危险的。从那时起，我对这条真理就坚信不移。